

# 从并立到综合： 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范式的创新发展<sup>\*</sup>

李智

**【摘要】** 一门学科有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式。对交叉学科来说，其学科研究范式是双重或多重的。就国际政治传播学而言，其研究范式是双重的，既有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又有传播学的研究范式。迄今为止，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这两种基本的学科研究范式同时被采用。随着国际政治传播学科研究范式从并立走向综合，构建起以“国际（政治）信息人”为逻辑前提的、统一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发展取向。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既“范导”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又保证和促进国际政治传播学知识的持续增长。

**【关键词】** 跨学科范式 范式并立 范式综合 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 国际（政治）信息人

**【作者简介】** 李智，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20)04-0065-07

一门学科既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有其观照和分析研究对象的特定视角和框架。这种观照视角和分析框架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不同学科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即使面对相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因而，研究范式成为一门学科之所以是该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重要表征。这种能够区分学科门类、作为学科标志的研究范式也被称为学科范式——学科研究范式。一门学科对应一种学科（研究）范式。对交叉学科来说，由于其双重乃至多重学科属性，一般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学科范式并存，供学术研究使用。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具有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双重学科属性，相应地，两种学科范式——国际政治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并存于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下，这两种并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将会不断走向综合。

## 一、学科范式间的并立：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范式的现状

国际政治传播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或者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性

<sup>\*</sup>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研究”（CUC2019A007）和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建设支持项目“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传播路径研究”（YLTS180608）的阶段性成果。

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一直存在于当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分布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范畴内。涉足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专业背景——如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传播学等——出发来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现象。纵观近年来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说来，主要有两套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并行于其中。

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国际政治传播具有多重属性，但有两种属性是最为基本的：其一是国际政治性，因为它是一种跨国性的政治行为；其二是传播性，因为它是一种跨国性的信息传播行为。与之相对应，研究国际政治传播，有两种最基本的学科范式：一种是与国际政治性相应的国际政治学范式，一种是与传播性相应的传播学范式。

作为一种从国际政治或权力的角度来观照和分析世界的方式，国际政治学范式从国际政治即权力的视角来看待国际政治传播现象，把“国际政治传播”首先视为一种国际政治活动，因而以国际政治为本位即“国际政治本位”。在此，国际政治与传播是一种体（本）与用的关系——国际政治是“体”（“本”），是本体或主体；传播是“用”，是功用，是国际政治的表现形式（即工具或工具性行为）和实现方式（即实现国家的国际政治目标——国家利益或权力——的手段）。进而，用诸多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范式（框架）如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或建构主义来分析、解释国际政治传播现象和实践。从学科本位来说，由于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以国际政治为本位，因而，国际政治学成为了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本位学科。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范式运作下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或国际政治传播学通常归于国际政治学的学科范畴之内。

同样，作为一种从信息传播、交流或沟通的角度来观照和分析世界的方式，传播学范式从信息交流或传播的视角来看待国际政治传播现象，把“国际政治传播”首先视为一种传播活动——一种带有政治性的跨国信息交流或传播活动，因而以传播为本位即“传播本位”。在此，传播与国际政治是体（本）与性的关系，传播是“体”（“本”）即本体或主体，国际政治是性即属性——国际政治性。这种国际政治属性是通过传播的工具或工具性内容——国际政治——来体现的。进而，用诸多传播学的理论范式（框架）如拉斯韦尔的“5W”框架、“二级传播”理论、把关人理论、各种媒介理论、受众理论及效果理论来分析、解释国际政治传播现象和实践。从学科本位来说，由于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以传播为本位，因而，传播学成为了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本位学科。也就是说，传播学范式运作下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或国际政治传播学通常归于传播学的学科范畴之内。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基本的学科研究范式，还有两种非基本的研究范式即国际传播学范式和政治传播学范式也存在于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把“国际政治传播”解读为“国际（的）政治传播”或“国际政治（的）传播”，也就是说，分别把国际政治传播首先视为一种跨国性的政治信息交流活动或一种带有政治性的跨国信息交流活动。对国际政治传播的上述两种解读分别是以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为本位的。在此，“政治传播”与“国际”、“国际传播”与“政治”都是体（本）与性的关系，前者（政治传播、国际传播）是“体”（“本”），是本体或主体；后者（国际、政治）是“性”即属性（国际性、政治性）。基于对国际政治传播的上述两种解读，学者们分别用政治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两套学科范式（框架）分析、解释国际政治传播现象和实践。鉴于不论是政治传播学还是国际传播学在学科归属上都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无论是政治传播学学科范式还是国际传播学学科范式，都归属于传播学的学科范式，因而，它们都不具有独立的学科范式的地位。

归纳起来看，自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开启以来，上述两种基本的学科范式——国际政治学范式与传播学范式——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既遵循各自的认知逻辑独立地进行知识生产，又使各自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相互参照，共同推动着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基于此，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学术史的书写和叙事几乎都是以这两种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学科范式之间的对立和互补为主线来展开的。

## 二、超越学科范式间的并立：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范式的发展困境

迄今为止，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两种基本的学科范式——国际政治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各自在不同的学术轨道上运行，并没有相互趋近，更没有相互交叉、融合，甚至两者之间也未曾展开对话、辩论。这种两套学科研究范式并立并行的状况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着理论创新的空间，阻碍了国际政治传播学知识的进一步增长。

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发展史向我们昭示：一般来说，一门学科的理论知识主要是由两种乃至多种竞争性的、并立的理论范式所构成的。一门学科的发展往往是由其主要的理论范式间的辩论和综合所促成的。在同一学科内部，通常首先表现为各并立的（理论）“范式间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而正是在（理论）范式间的辩论中展开（理论）范式间的综合（inter-paradigm synthesis），建立起弥合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壁垒与隔阂的综合性（理论）范式。<sup>①</sup> 这种范式（间）综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折中式的外在综合，即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两种或多种理论，选取各自的一两个概念和要素（变量）加以组合，整合到一个松散的分析框架内，多因性地共同解决某个社会经验问题。这种理论综合方式的特点是对各种理论的概念或变量的选择组合是随机性的，所构建的理论范式是脆弱的。另一种是合成式的内在综合即融合，即通过各种理论的基本假设的妥协修正、基本概念的移植挪用和核心命题（论断）的接受吸收，在融通这些理论各自的合理要素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解释力更强（更能解释某种社会经验现象）的新理论范式（解释框架）。这种理论综合方式的特点是对各种理论的概念或变量的吸收融通是有机性的，所构建的理论范式是稳定的。

上述理论范式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范式间辩论还是范式间综合，都是发生在同一门学科内部，因为这些理论范式本来就是在同一门学科下的，因而都属于同一种学科范式，是同一门学科的同一种学科范式下的多种理论表现形态。

社会科学的一般学科发展规律启示了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如同一般性学科，一门交叉学科要突破知识增长的障碍，必须走（研究）范式创新之路。换言之，对一门学科（无论是一般性学科还是交叉学科）来说，要实现知识增量，最有效的途径是创新（研究）范式。而通过（研究）范式间综合建立起综合性（研究）范式是（研究）范式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在此，如果说一般性学科内的（研究）范式间综合是各种理论范式的综合，那么，交叉学科内的（研究）范式间综合则是各种学科范式的综合。

如前所述，学科的身份标识和学科知识的核心要素是学科研究范式。应该说，缺乏一套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将成为作为交叉学科的国际政治传播学科发展和学科知识增长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危及到国际政治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合法性（独立性）。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交叉学科能否像一般性学科那样进行研究范式间的综合，从而建立一套综合性的统一的研究范式。不同于一般性学科内各种理论范式间的综合，交叉学科内各种学科范式间的综合（无论是外在综合还是内在综合）需要克服、超越或弥合的思维壁垒和学理隔阂要大得多。

一般来说，在同一门学科内，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特定的本体论基础和基本的理论假设，因此，理论范式之间存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的分歧，但不管分歧有多大，毕竟是在同一门学科内，都属于同一种学科范式，因而还是共享本体论层面上的基本假设的。譬如，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内，三种并立的竞争性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各有其基本概念、关

<sup>①</sup> 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191~192页。

键命题、核心逻辑及论证过程，但都在国际政治学学科范式之下，因而还是共享一套基本的本体论假设即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处于物质性的无政府状态之下。交叉学科则不然，交叉学科内的不同学科范式之间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难以弥合的，各自的基本的学理假设和逻辑前提难以通约（共享），或者说，可通约性低，由此，其核心概念、命题、理论及论证逻辑极为殊异而难以融通。因而，要综合两种从根本处、起始处就存在分歧的学科范式实属不易。这就是交叉学科内学科范式间难以综合（哪怕是折中式的外在综合）而构建学科间或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式的根源所在。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的两大基本学科范式——国际政治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之间在哲学本体论基础、基本的学理假设和逻辑前提上存在的根本分歧难以弥合，前者以国际权力为本体、以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学理假设、以主权国家的自我中心性或自助性为逻辑前提，后者则以信息为本体、以社会的有机结构为学理假设、以个体的社会性存在为逻辑前提。正是由于本体论基础、学理假设和逻辑前提难以通约，两大学科范式各自所包含的核心概念、命题、理论和论证逻辑亦难以融通。那么，通过学科范式间的综合即综合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两大学科范式来构建统一的综合性学科范式——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是否可能？这成为摆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面前的一大难题。

### 三、学科范式间的综合：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范式的创新发展

至此，问题的关键是：是否会形成一种综合两种学科研究范式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供未来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之用，从而推动和促进国际政治传播学知识的持续增长？从人类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发展史看，借鉴跨学科知识（包括概念和理论）以应对社会现实提出的挑战，是一门学科知识增长的一条路径。各门学科相互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在通常情况下，跨学科知识的借鉴就是：为更有效地分析、解释某种社会现象，一门学科把另一门学科的某个或某些概念或理论适当改造后，引入到自身的分析框架内加以运用。这种跨学科知识的借鉴仍然只是概念和理论在学科间的移植和挪用，其中的核心逻辑和论证过程仍然属于前一门学科（而不属于后一门学科），因而尚未构建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学科间）的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

如前所述，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所倚赖的研究范式的创新在于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学科间）的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在哲学本体论基础、基本的学理假设和逻辑前提上的根本分歧难以弥合，其可通约（共享）性低。但是，毕竟这两种学科研究范式各自所属的学科——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都是（人类）社会科学，从本质上说都是“人学”，因而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都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性——属人（人文）性和社会性，因此，两种学科范式在本体论基础、基本的学理假设和逻辑前提上还是可以对话和沟通的。而本源性的对话和沟通恰恰是在不同的学科范式间构建跨学科（学科间）的统一的学科范式的先决条件。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以往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两种学科研究范式之间并立即彼此分立乃至对立的状态，由对立走向对话，在对话中相互沟通，在对话和沟通中实现综合。

那么如何实现两种学科研究范式在本体论基础、基本的学理假设和逻辑前提上的对话和沟通呢？无疑，必须寻找到能够克服和超越两种学科范式的思维壁垒和学理隔阂的共同的对话和沟通平台。为此，两种学科范式各自的本体论假设或逻辑前提必须相互妥协，以跨越观照世界视角上的鸿沟，从而达成和解，进而构建起统一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式。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范式是国际权力本

体论的，而传播学范式是信息本体论的，前者以国际社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的逻辑前提，后者以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的逻辑前提。那么，鉴于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都是关于人的学问，都属于“人学”，在国际权力与信息之间，在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我们可以从本体论层面上找到一种可以共享的人的学科属性假设——“国际（政治）信息人”——作为基本的学理假设。

所谓“国际（政治）信息人”，是指兼具国际（政治）属性和（社会）信息属性这双重本质属性即双重学科属性的人。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信息人”，<sup>①</sup>即通过制造、运用符号来传播（包括接收）社会信息的动物。信息（传播）不仅仅是人的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人的社会生存本身。人本来就是以信息传播的方式存在于世，信息传播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换言之，信息传播活动不仅仅是人形成、维系和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因而，信息（传播）对人而言具有本体的地位和本体论（存在论）上的意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信息。人本然地是“信息人”，即“人=信息人”；其次是“国际（政治）人”，即通过国际交往而存在于国际（政治）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关系网络无限延伸的今天，人类越来越相互依存，国家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不再只是国内社会的延伸，同时也是国内社会的放大。也就是说，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叠而具有越来越大的同一性。因此，人，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即社会人，他（她）既存在于国内社会，同时又存在于国际社会。他（她）既是国内（社会）人，又是国际（社会）人——国内（社会）人和国际（社会）人这两重社会属性几乎是同时赋予的。诚然，在一个互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人类生存现实越来越“跨国化”“网络化”，因而，人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多重化，个人不再只有民族国家身份，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公民身份。从上述意义上说，人至少越来越是“国际（社会）人”。鉴于任何社会（无论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是一张人置身于其中的权力关系网络，都具有政治性，因而都是政治社会，国际（社会）人同时就是“国际（政治）人”。而且，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对人而言同样具有本体性的意义，人本然地是“国际（政治）人”，即“人=国际（政治）人”。最后，综合而统一起来看，人既是以信息传播的方式存在于世的“信息人”，又是存在于国际（政治）社会中的“国际（政治）人”。归之，人是以信息传播的方式存在于国际（政治）社会的“国际（政治）信息人”。基于人同时是“信息人”和“国际（政治）人”，对人而言，“信息人”与“国际（政治）人”是一体两面的，即同一个人的两种面向而已。而且，鉴于人与“信息人”和“国际（政治）人”都具有绝对同一性，“信息人”和“国际（政治）人”也是相同一的——“信息人”即为“国际（政治）人”，“国际（政治）人”即为“信息人”。因此，“国际（政治）信息人”可等同于“国际（政治）人”或“信息人”。

学理假设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范式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基于某一学理假设而展开的。基于“国际（政治）信息人”这一学理假设的确立，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获得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正是基于将“国际（政治）信息人”这一人的学科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国际政治传播学可以构建起一种统一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可以说，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既是对国际政治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的综合，又是对国际政治学范式与传播学范式的双重超越。在“国际（政治）信息人”这一逻辑假设的推导和规范下，国际政治传播学研究范式将生成新的核心概念、命题和论证逻辑，由此而重新审视、解析原本分属于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两种学科范式下的各种理论（范式），展开理论的重组和重构，建立起新的理论丛或理论家族。

<sup>①</sup>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无论是国际政治学范式还是传播学范式下的——几乎都采取国家（本位）主义研究范式，都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中心和基本分析单位。与之相对，新构建起来的以“国际（政治）信息人”为基本假设的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则要求以人为本位来展开研究，要求研究视角从主权国家转向（国际）人，从国际关系转向跨国人际关系，并聚焦于（国际）人与跨国人际关系的探讨。也就是说，要以（国际）人为研究的出发点、中心和基本的分析单位。就此而论，从方法论上看，新的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属于人本（位）主义的学科范式。诚然，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下，尤其在社交媒体的技术支持下，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个人譬如意见领袖（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公众人物）和普通公众等纷纷参与到国际政治传播活动中，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都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或大众外交。由此，国际政治传播实践正日益走向微观化、个体（个人）化、人性化且个性化，国际政治传播越来越呈现出跨国性的具有政治属性的人际传播的一面。正是基于此，新的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从国际关系即国家间的冲突、对抗和合作中抽拔出来，首次发现了“人的维度”（human dimension），更为普遍地从人的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传播现象和问题。“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all people matter），而世界上现存的、规范和管制信息跨国流动的各种国家权力并不都符合尊重和回归到人性和人本身的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国际）人（而非主权国家）及人权（而非国家主权）应该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关切点。<sup>①</sup>一方面，作为国际政治传播的受众，（国际）人不仅仅是国际政治宣传的对象，而且是拥有跨国政治传播权利的主体——世界公民。与此同时，“（国际）人”的人权即人的传播权（right to communication，寻求信息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也是国际关系中主宰信息流通的基本原则（除了国家政治主权）。<sup>②</sup>由此，让（国际）“人”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关切点，这正是以“国际（政治）信息人”作为逻辑起点的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所要求的。基于国际政治传播主体和渠道的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国家（本位）主义方法论范式将日益受到挑战，人们将超越单一国家、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利益的局限，从更广阔、更多维的视角超拔地看待国际政治传播现象及其中的不平衡不公正问题，并提出各种理想的国际政治传播图景及诸多替代性的国际政治传播策略。可以预期，在新的统一（综合性）的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的观照和分析下，人类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将呈现出一幅以（国际政治）人为中心、以主权国家为背景的人文主义新景观。由此，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将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并生成众多新的蕴含“国际（政治）信息人”这一人的学科性假设的国际政治传播理论（范式）来。

（学科）研究范式既是学术研究的工具，又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作为综合两种并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的产物，统一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的确立不仅是国际政治传播学科研究范式的创新，更是国际政治传播学科知识（以理论知识为主体）增长的保证。新的统一的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的引入和运用将有力地促进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及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发展，从而有效地实现国际政治传播学知识的增量，最终从根本上夯实国际政治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合法性（独立性）基础。

① 陈开和：《国际传播的研究历程及其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联系》，关世杰主编：《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② [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7~38页。

## 结语

学科研究范式既是一门学科最重要的身份标识，又是其最核心的知识要素。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科研究范式的探索和创新。交叉学科亦是如此。而且，相比于一般性学科，由于其学科研究范式的多重性和跨学科性，交叉学科通过学科研究范式间的综合构建起统一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式的难度更大。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传播学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以往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两种学科范式——国际政治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之间并立的状态，实现两种学科范式间的综合。为此，必须寻找到能够克服和超越两种学科范式的本体论假设的共同的对话和沟通平台或基点——“国际（政治）信息人”（人的学科属性）假设，并以此为逻辑前提，构建起统一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国际政治传播学范式的确立和运用将有力地促进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开展及国际政治传播学科的发展，并有效地实现国际政治传播学知识的增量。

（责任编辑：何晶）

## From Coexistence to Synthesis: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i Zhi*

**Abstract:** Each discipline has its research paradigm. For an inter-discipline, the paradigm is double or multiple. As far 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concerned, its research paradigm is dual, which include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So far, the two paradigms have been adopted separately in th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trans-disciplinary paradigm, which transcends the coexistence and moves towards the synthesis of disciplinary paradigms, will be the futur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new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ypothe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formational Man” as its logical premise, remains a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paradigm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its knowledge.

**Keywords:** trans-disciplinary paradigm; coexistence of paradigms; synthesis of paradigms; the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formational Man